

中日外交话语的情态表达对比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陈冬姝

[摘要] 情态反映国家立场态度和意识形态,关乎“我者”与“他者”形象的诠释与再建构。以2023年中日外交发言人的话语为语料,聚焦合作与对立话语类型中的情态表达,比较分析中日态度立场表达的言语特征及其背后的国家形象建构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外交话语多为“合作型”和“对立型”,情态类型分布随话语类型的变化而调整,“合作型”偏好动力情态,“对立型”偏好道义情态,彰显立场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直接性,塑造立场明确的“责任型大国形象”。日本外交话语多为“合作型”和“合作+对立型”,“对立型”较少,情态类型分布与话语类型的变化无关,均倾向于使用动力情态,映射立场表达方式的单一性、和谐性,塑造协调优先的“温和型国家形象”。

[关键词] 外交话语 政治话语 情态 国家形象

引言

外交话语(diplomatic discourse)作为政治话语的重要分支,是主权国家通过其官方代表,使用适切的语言策略维护其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采用的话语(毕卓、刘风光,2022),包括国家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声明和宣言、外交谈判、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的发言等(胡开宝、李婵,2018)。在宏观层面,外交话语有别于以人际互动为核心的日常交际,它是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构建的核心要素(杨明星,2021),有其独特的表达偏好,蕴含极强的立场态度性和意识形态性。在微观层面,情态(modality)是最能反映国家立场态度和意识形态意义的言语形式之一,深受外交理念与政治局势的制约。因此,研究外交话语中的情态表达,不仅有助于揭示国家话语的立场表达逻辑,也能为实现从语言形式到政治意义的多层次融合研究提供重要路径。

学界研究政治话语当中的情态使用问题主要参考Palmer(2001)的民族模型和Halliday(1994)的功能模型,多关注汉语或英语语料,内容包含英语政治语篇中的情态动词研究(严世清、赵霞,2009)、中国外交话语英译文本情态研究(李鑫、胡开宝,2013;Fu,2016;胡开宝、田绪军,2018)、英汉政治语篇的情态表达对比研究(王彦、陈建生,2016;任凯、王振华,2017)等。然而,上述情态研究缺少东北亚语言的分析视角,也普遍忽视了外交话语中因话语类型不同而导致的情态使用差异。事实上,在外交语境中,外交主体不仅有反映协同、赞扬与肯定等积极立场的合作型话语实践,也有表达批评、反对与否定等消极立场的对立型话语实践。不同类型的话语承载着差异化的态度立场,情态资源的运用势必也因此呈现相应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不同政治语境下外交主体对外交策略的精细权衡,也揭示了国家在合作与对立之间调节话语权的语言机制。

鉴于此,本文基于自建“中日两国外交发言人专题语料库”,调查中日两国外交话语情态表达的异同,特别是在合作、对立等不同话语类型中的表现,揭示中日外交主体在表达各自立场态度时的言语表征倾向及其背后的国家形象建构机制,为国家话语对日的发声方式提供佐证和阐释。

1 情态理论、政治语篇研究与外交话语类型

1.1 情态系统的理论基础

西方对情态的研究主要有四大理论框架:逻辑模型、认知模型、民族模型和功能模型(Lampert & Lampert 2000)。其中以Palmer(2001)为代表的民族模型对英汉日语的情态研究影响最深。Palmer(2001)引用了世界70多种语言,从类型学视角将跨语言的情态系统划分为两大范畴:命题(proposition)和事件(event)。其中,命题情态又可分为认识情态(epistemic)和示证情态(evidential)两个次范畴,前者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真实性程度的判断,后者表示德语等语言中对命题的事实证据做出的判断。事件情态则分为道义情态(deontic)和动力情态(dynamic)两个次范畴,前者表达主语的某种责任、义务或对某事的承诺,后者则表示主语的能力或意愿。Palmer认为,在讨论绝大多数语言的情态语义系统时,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均是核心类型。

吕叔湘在《中国语法要略》中将汉语情态分为“可能”(包括能力、许可、推测)和“必要”(包括主观必要、事实必要、情理必要)两大类。根据其论述,推测属认识情态;许可、事实必要、情理必要属道义情态;能力、主观必要属动力情态。崔希亮(2003)提出情态助动词为“施事情态”,表达物力论与道义论情态。徐晶凝(2022)则认为情态助动词亦可表达认识情态,并指出情态助动词、心理动词及情态副词可标注认识与道义情态的梯度。彭利贞(2005)依据Palmer(2001)的模型,将情态动词分为单义与多义两类,系统论述了认识、道义、动力情态对应的汉语表达,印证了Palmer分类体系的解释力。

仁田義雄(2009)对日语情态系统的分类与Palmer(2001)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将“事态指向情态”(「事態めあてのモダリティ」)分为认识类、评价类、情意类三个小类,基本对应认识、道义、动力情态。王晓华(2011)在对日汉情态系统分类时同样采用了认识、道义、动力三分法,构建了日汉对比分析的共同范式。此外,玉地瑞穗(2005)在Palmer的情态分类框架下,详细罗列了日汉语分别对应的认识、道义、动力情态表达,再次证明该分类能够统摄日汉两种语言中复杂的情态系统。

由此可见,汉语和日语学界的情态研究深受Palmer(2001)的情态体系框架影响,均存在认识、道义和动力三大范畴。然而,汉日语的情态表达手段复杂,形式层级丰富,组合规则复杂。汉语可以借助情态动词、情态副词和句式结构等参与表达,也可层叠组合(例如“可能会想要去”)。日语存在叠加组合(例如「行くべきかもしれない」[可能应该去])和形式上的活用变化(例如「できる/できた/できている」[能/能够]),还存在「のだ」「わけだ」「ものだ」「ことだ」等表达解释的“说明情态”以及表达感叹、愿望等意义的终助词,将上述形式全部统括考察难度巨大。因此,本文重点统计中日外交话语中表达认识、道义、动力的典型情态标记及其活用形,情态叠加出现时拆分考察。但汉语“吗、嘛、呢、吧”等语气助词以及日语终助词「よ」「ね」等暂不作为考察对象。“说明情态”并非认识情态或道义情态的典型(野田春美,2012:142),亦未纳入本次调查范畴。

1.2 情态在政治语篇中的应用

当前,学界对情态的探讨逐渐实现了从描述情态表义系统(益岡隆志,1991;崔希亮,2003)向阐释情态与语用、人际关系及语篇之间的相互作用(高梨信乃,2010;Tantucci & Wang,2018;徐晶凝,2022)的转向。受此影响,近年来英、汉语学界开始关注政治语篇中的情态动词、模糊限制语等问题(胡开宝、田绪军,2018;杨明星、王钊繁,2020)。例如严世清、赵霞(2009)调查了两名美国政治人物言论中情态动词的类型分布,发现认识情态的使用频率高于道义情态。Fu(2016)的研究显示,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英语口语译中多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与表意志的情态动词搭配,低值情态动词的使用偏少。任凯、王振华(2017)发现英语政治语篇倾向于使用中

低量值情态词,多用“概率”和“意愿”类情态词,而汉语倾向于高量值情态词,多用“义务”和“意愿”类情态词。胡开宝、田绪军(2018)指出,中国外交话语英译中的情态动词主语多指向“we”,表达中国政府的意愿与决心;美国外交话语中的高量值情态动词常以其他国家为主语,表现出对他国施压的企图。李鑫(2018)发现中国记者汉英口译中90%的句子都涉及情态量值的偏移。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强调情态类型划分与情态量值在中美政治语篇中的分布与功能,较少关注东北亚语系国家,尤其是中日外交话语的情态特征。

日语学界的政治话语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关注隐喻(黄一峰、姚艳玲,2021)、言语行为的语用策略与功能(曹金波等,2020;金稀玉、王怡雅,2024)、政治术语及特色表述翻译效果(修刚等,2018;李运博、卿学民,2025)等。其中,金稀玉、王怡雅(2024)对日本外务大臣在记者会上所采用的信息过量策略进行了分析,特别指出其通过意向表达(如「～ればと考えています」)与情感表达(如「たい」)来体现合作姿态(金稀玉、王怡雅,2024:81),为理解日本外交话语中的情态表达提供了重要视角。

1.3 外交话语类型的界定与既有研究述评

交际过程中,维护说话人或听话人的面子符合交际双方的最佳利益(Brown & Levinson, 1987)。“通过攻击性言语或行为威胁听话人的积极面子或消极面子,破坏和谐关系的行为”(Culpeper, 1996: 349-350)属于不礼貌行为。因此,说话人的话语信息越体现赞同、肯定、赞赏、合作,越容易推动人际关系的正面发展;相反地,说话人的话语信息越表现出反对、否定、批评、对立,越容易阻碍人际关系的正面发展。人际交往中存在缓和与冲突这两种常态(冉永平,2010)。缓和性话语是“趋同/求同”的表现(Norrick & Spitz, 2008);冲突性话语是听说双方在认识、立场、观点等方面“趋异/求异”的一种表现。外交话语当中,“趋同/求同”与“趋异/求异”同样是两种常态,前者体现合作,后者体现对立。龚双萍(2020)分析了对立型外交话语的冲突性特征,将其界定为“通过反对来维持自己的立场”(龚双萍,2020:27)的话语实践,其语用功能备受关注(冉永平,2010;毕卓、刘风光,2022)。马倩、文秋芳(2022:13)则将对立型外交话语定义为“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区分敌我、划分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然而,马倩、文秋芳(2022)将“明确表示赞成”分为对立型外交话语的分类方式欠妥,“表示赞成”起到了维护听说双方正面面子的积极作用,其语用功能与“表示反对”的对立型/冲突性外交话语存在本质差异,应属合作型。可以看出,尽管前人认识到外交话语具有合作性与对立性,但其内部界定标准过于简化,未充分揭示“礼貌”与“不礼貌”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深层作用。正如Fairclough(1995)所指出的,话语的人际层面往往蕴含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礼貌与不礼貌不仅是人际互动的言语资源,更是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体现,其通过语气、情态等手段建构互动关系,塑造合作或对立的立场态度。

此外,本文的调查发现,除“合作型”与“对立型”之外,中日外交话语中还存在两类值得关注的话语类型:一是同时表达合作意图与反对立场的“合作+对立型”,二是不明确表露情感态度、以传递外交信息为主的“中立型”。这两类话语,尤其是“合作+对立型”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态选择与立场构建方式。然而,已有研究多将情态视为一种静态的语法范畴,着重于类型划分、语义特征及其句法表现,较少将其与具体话语类型(合作型、对立型等)相结合,忽略了不同外交语境中情态表达与外交策略、国家形象的互动关系。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情态表达—话语类型—国家形象”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出发,探索情态表达在不同话语类型当中的政治功能。

2 中日外交话语情态比较的框架与方法

2.1 框架构建

外交话语本质上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性(杨明星,2021)。作为语言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

交叉研究对象,外交话语的研究不仅须关注语言形式,更须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语境(Wodak & Meyer, 2016)。因此,仅依赖单一维度或单一理论框架,难以全面揭示外交话语的语用动因及其政治功能。鉴于此,本文在研究设计上构建了兼顾语言学与政治学视角的多层次分析框架,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

微观层面,以Palmer(2001)的情态体系为理论基础,系统分析中日外交话语中情态表达的类型与分布特征,揭示外交主体在语言层面上的意图呈现;中观层面,依据礼貌与不礼貌理论,对外交话语进行类型划分,考察不同外交语篇中态度表达与策略选择的差异;宏观层面,结合中日外交议题与国家形象建构,探讨情态表达与话语类型如何在特定政治语境中服务于国家身份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本文力图突破以往仅停留于语言表层的研究局限,更全面地揭示外交话语中语言形式、策略选择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实现对外交语篇的多维度阐释。

2.2 语料收集

本文自建“中日两国外交发言人专题语料库”,涵盖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全年外交部/外务省例行记者会的全部场次,涉及多类外交议题与事件。汉语语料选取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公布的例行记者会问答环节的转写文本,包含2362条发言,共计343,847词。日语语料选取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s://www.mofa.go.jp/mofaj/>)公布的记者会问答环节的转写文本,包含623条发言,共计141997词。

由于汉语语料远远多于日语语料,约为日语语料的4倍,本文采取半距起点等距抽样法(李莉2019),将汉语语料依据4:1的比例,按照时间顺序抽取编号为2、6、10、……、2362号的发言,共得到591条语料作为汉语分析数据。

2.3 分析流程

(1)在汉语方面,本文以王振来(2002)提出的汉语高频使用的20个典型能愿动词为基础,同时参考彭利贞(2005)、玉地瑞穗(2005)对认识、道义、动力情态的分类框架;在日语方面,参考仁田义雄(2009)、玉地瑞穗(2005)、王晓华(2011)对日语情态类型的系统归类。在此基础上,结合中日外交话语的实际表达特征,对既往研究中出现的情态标记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归纳提炼,最终选取了两语中体现认识、道义、动力的代表性情态表达共计56类(其中汉语27类,日语29类)作为调查对象,详见表1。需要指出的是,其中部分表达(如“期待”“期待する”、“相信”“決して……ない”)虽在既有研究中尚未被明确归类,但在外交话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拥有极强的态度意义。为更全面地反映外交语言的实际表达特征,本文亦将此类表达纳入分析范围,作为对现有分类体系的适度补充。

表1 本文研究对象

	认识情态	道义情态	动力情态
汉语	必/必然、必定、大概、得、或许、会、可能、肯定、能/能够、认为、要、也许、一定、应/应该/应当/该、准	必须、得、会、可以/可、肯定、能/能够、务必、要、一定、应/应该/应当/该	敢、会、可/可以、肯、乐意、能/能够、期待、希望、相信、想、要、愿、愿意
日语	かもしれ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が可能/可能性がある、決して……ない、そうだ、だろう、と思う、と考える、……にちがいない、認識する、はず、みたい、ようだ、らしい	ざるを得ない、たらない、てもいい、とい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くてはいい、ばいい、必要がある/が必要、べき、ほうがいい	期待する、しよう、信じる、たい、できる、と思う、と考える、願う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既往研究,并结合外交话语实际特征系统整理后制作。重复出现的为多义情态。汉语按照拼音顺序排列,日语按照あいうえお顺序排列。

(2)借助语篇分析软件KH Coder 3.0中的分词工具(日文为ChaSen,汉语为Stanford POS Tagger & Stanford Word Segmenter)以及“强制提取”功能,逐个提取表1显示的中日情态标记,统计各个情态的出现频率。

个别机器无法提取的情态由人工完成筛选。

(3)逐条阅读中日外交话语的回答内容,并依据“①合作型”“②对立型”“③合作+对立型”“④中立型”四类态度倾向(分类标准详见3.2节)进行人工分类。该分类由笔者在内的3名日语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为验证分类的一致性,使用Fleiss'κ系数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三位研究者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汉语 $\kappa=0.845, p<0.001$; 日语 $\kappa=0.779, p<0.001$)。

(4)基于Palmer(2001)的情态体系框架,结合上下语境分别对“①合作型”“②对立型”“③合作+对立型”话语中出现的中日情态表达逐一分为认识、道义、动力三大类,比较不同话语类型中情态类型的分布差异。在对多义情态动词进行分类时,本文充分考虑其语境依附性,由研究者通过人工逐条核对的方式确定其情态类型,以确保分类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5)借助中日不同类型外交话语的对应分析结果,结合上述定量分析,揭示两国在外交表达方式与国家形象建构机制上的根本不同。

3 情态表达与话语类型的互动关系

3.1 中日外交话语的高频情态

调查显示,中日外交话语中的前15位高频出现的情态表达差异明显(见表2)。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情态表达分布相对均匀,前3位的“应/应该/应当”“愿”“要”出现频数合计464例,每百万词的出现频数(Per Million Words,以下简称PMW)共5742.1次,占据前15位情态表达总数的45.7%。但日本外交话语中情态表达数量分布极度失衡,前三位表示说话人主体意愿或心理的「たい」(想)、「と考える」(觉得/认为)、「と思う」(想/觉得)总计1482例,每百万词的出现频数(PMW)共10,436.9次,占据前15位情态表达总数的72.1%,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表现出一种对主观意愿表达的偏好。

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前3位高频情态表达中“应/应该/应当”和“要”均为多义的情态动词,可用于不同的情态语义域。其中,“应/应该/应当”不仅能表达发话者对听话者的义务要求,即道义情态,也能用于表示

表2 中日外交话语高频情态表达对比

汉语	频数	PMW	日语	频数	PMW
应/应该/应当/该	208	2574.0	たい(想)	612	4310.0
愿	134	1658.3	と考える(想/认为)	589	4148.0
要	122	1509.8	と思う(想/觉得)	281	1978.9
希望	106	1311.8	できる(能/能够)	176	1239.5
可以/可	92	1126.1	べき(应该)	89	626.8
会	91	1138.5	(のではない)か(是不是)	69	485.9
能/能够	63	779.6	必要がある/……が必要(有必要)	64	450.7
认为	51	631.1	期待する(期待)	50	352.1
想	40	495.0	(と)認識する(理解、认识)	41	288.7
相信	27	334.1	……が可能/可能性がある(有可能)	29	204.2
需要	26	321.8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くてはならない(不得不/必须)	26	183.1
必/必然	16	198.0	決して……ない(绝对没有)	12	84.5
必须	15	185.6	しよう(想要……)	11	77.5
可能	13	160.9	ざるを得ない(不得不)	4	28.2
期待	12	148.5	かもしれない(可能/也许)	3	21.1
总计	1016	12573.2	总计	2056	14479.2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本文情态使用频率的统计结果制作。

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评估,属于认识情态。同样,“要”既可用于表述对未来事件的预判,也可用于强调义务或意图。然而,语料库考察可知,“要”和“应/应该/应当”主要用于表达道义情态,强调动作主体的义务(例4、9)。这不仅反映了外交话语中对事件的义务的强调,也凸显了发言主体明确而坚定的态度立场。

在日语的外交话语中,情态表达高度集中于几种特定类型,尤其是「たい」「と考える」「と思う」这三种表达。其中,「たい」直接表达了说话者的意志或愿望,属于动力情态。而「と思う」「と考える」这两个心理动词的情态类型则更为复杂,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当「と思う」或「と考える」接续「たい」时,表达话语主体的主观意愿、愿望,属于动力情态;当其单独出现或前接判断性语气词(如「か」)时,往往代表外交主体的主观判断,属于认识情态。实际上,「たい」共出现612次,其中有581次都在其后接续了心理动词「と思う」或「と考える」,说明动力情态在日本外交话语中分布广泛。

那么,不同话语类型的视域下,中日外交话语中情态表达的使用会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下文将分类展开讨论。

3.2 中日外交话语的类型分布

外交话语中常常交织出现既含礼貌又含不礼貌的言语行为。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包括“表达与对方的一致性”“显示理解与合作意图”以及“表达承诺”等在内的15项积极礼貌策略,用以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需求,促进合作性交流。Bousfield(2008)则系统总结了包括“表达否定”“表达批评”等15种不礼貌策略,强调话语中冲突性、对立性因素的表达。

本研究借鉴上述两类策略体系,结合中日外交语篇的实际表达特征,从态度倾向的角度出发,对外交话语分为以下四类:①以积极礼貌策略为主、展现赞同、认可、赞扬及合作等积极交流的“合作型”;②以不礼貌策略为主、涉及表达反对、否定、批评和分歧等消极立场的“对立型”;③兼具积极礼貌与不礼貌策略、呈现复杂态度结构的“合作+对立型”;④缺乏明显态度取向、既不“趋同”也不“趋异”的“中立型”,这类话语通常是对问题的回避或仅仅是提供相关信息的交流方式。表3罗列了“合作型”“对立型”话语常见的语言形式,“合作+对立型”的常用表达兼具表3所列的合作与对立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中立型”话语,例如“关于具体人选,建议关注外交部网站有关更新”或「日・比首脳会談の内容につきましては、現在調整中です」等表达旨在提供信息,其语言形式相对灵活、缺乏固定的句型,故未在表中列出。同时,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情态在合作型与对立型外交话语中的作用机制,“中立型”话语不涉及明确的立场表达,其情态使用暂不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本文基于表3,统计得出各类型话语的占比情况(见下页表4),揭示了两国外交话语在不同类型上的差异。

表3 “合作型”和“对立型”常见的语言形式

“合作型”常见语言形式		“对立型”常见语言形式	
汉语	日语	汉语	日语
中方愿同……一道/我们期待……	……と連携し/……を期待して	强烈谴责/……是不负责任的	……は暴挙である/非難する
中方支持/我们欢迎……	……を歓迎します/支持します	坚决反对/抗议	……受け入れられない/反対する
中方赞赏……	……を高く評価し/敬意を表し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措置/制裁を実施
感谢……	謝意を表明し/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是虚假信息/……与事实不符	……は事実無根/全く当たらない
对……表示祝贺	お祝いを申し上げます	中方敦促……/美方应……	……求める/……要請する
对……表示哀悼/慰问	お見舞いを申し上げ/心を痛めて	无权干涉/坚定维护我国利益	……断固たる決意で
我们呼吁/我们希望……	……を呼びかけて	令人遗憾的是……	……は遺憾であり/残念なが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本文“合作型”和“对立型”语料中常见的语言形式总结得出。

表4 中日外交话语各类型占比对比

	①合作型	②对立型	③合作+对立型	④中立型
中国(N=591)	255(43.1%)	136(23.0%)	128(21.7%)	72(12.2%)
日本(N=623)	290(46.5%)	79(12.7%)	202(32.4%)	52(8.3%)
χ^2, p 值	N.S.	$\chi^2=22.212, p<.001$	$\chi^2=17.758, p<.001$	$\chi^2=4.886, p=.027$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本文话语类型统计结果制作而成,卡方检验结果利用R计算得出。

调查结果显示,中日外交话语在“①合作型”的分布无显著性差异,表明双方在外交活动中普遍重视合作姿态的传达。然而,在“②对立型”和“③合作+对立型”这两类冲突倾向较强或复合型的话语类型上,呈现出显著差异($p<0.001; p<0.001$)。具体而言,中国的“对立型”外交话语比例为23.0%,明显高于日本的12.7%,反映出中国在外交立场表达中更倾向于直接展现批判性、否定性或强硬立场。相较之下,日本“合作+对立型”外交话语比例为32.4%,高于中国的21.7%,表明其更倾向于在保留批判或对立姿态的同时,辅以一定的合作性表述,以缓和语气维持表面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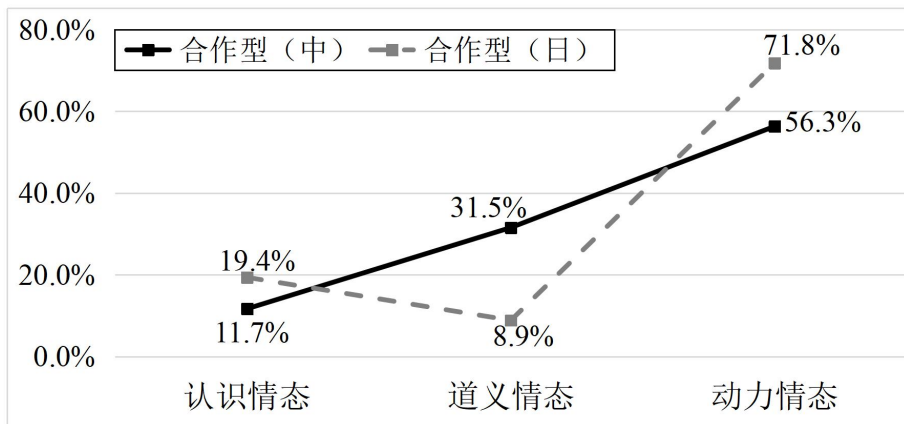
若将①③合并考察,在中国外交部的591条发言中,表达了合作立场的有383条,占总数的64.8%;在日本外务省的623条发言中,表达了合作立场的发言有492条,占总数的79.0%。这说明日本外交在语言层面更倾向于维持合作形象的建构;中国比日本更倾向于直接展现对立态度。

上文阐述了中日外交话语的类型差异,当外交主体明确表达“合作”或“对立”的话语倾向时,中日外交话语间又存在怎样的情态表达差异?下文以“①合作型”“②对立型”“③合作+对立型”话语为例展开讨论。

3.3 三类话语类型中的情态表达

3.3.1 合作型外交话语

图1展示了中日两国在“合作型”外交话语中所使用的情态类型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中日两国都倾向于使用表达积极合作意愿的动力情态表达,但日语动力情态占比(71.8%)高于汉语(56.3%),两者之间具有显著差异($\chi^2=32.18, p=.000$)。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本文统计结果制作。

图1 中日合作型外交话语中的情态类型分布对比

具体来讲,中日两国在合作型外交话语中广泛使用动力情态词,如汉语中的“愿”“希望”“期待”“相信”,以及日语中的「たい」「と思う」「と考える」等。这类情态表达多指向说话主体,体现出外交主体在国际合作

框架中主动作为、积极推动合作议程的主观意愿(例1、2)。

进一步来看,日语动力情态往往与具有外交行动指向性的动词组合使用。例如「たい」前出现频率在5次以上的动词有「差し控える」「ていく/てまいる」「取り組む」「連携する」「対応する」「進める」「行う」「議論する」「努める」「展開する」「検討する」「主導する」「協力する」「継続する」「意思疎通(を)する」「貢献する」「強化する」「(役割を)果たす」等。其中,「差し控える」表达回避,「ていく/てまいる」表示行动的持续,而其余动词多带有一定的合作语义,指向合作、努力、推动、执行、持续、贡献等积极外交实践行为。因此,合作型外交话语中动力情态与行为动词的系统共现,构成了“积极行动+积极意愿”的语篇模式,不仅传递友好与合作的外交立场,也塑造了正向积极的国家身份与国际形象。

(1)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就践行多边主义、维护粮食和能源安全、加强发展合作等发出积极信号。(2023.2.28)

(2) 我が国として、今回のG7 広島首脳コミュニケの内容も踏まえつつ、引き続き、G7メンバーや同志国との間で、緊密に連携し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2023.6.27)

我国基于此次广岛G7峰会联合声明的内容,希望今后继续与G7成员国及志同道合的国家保持密切合作。(笔者译,下同)

合作型外交话语中,日语认识情态的占比(19.4%)高于汉语(11.7%),这一差异主要缘于日语句末高频使用心理动词「と思う」「と考える」的高频使用。这些动词作为句末判断结构,在日语外交话语中发挥着缓冲语气的重要功能。例(3)中的表达不仅陈述了对ODA的评价,也通过认识情态的使用构建了语气上的慎重性,是日本外交话语当中表达判断的典型。

(3) ODAは、開発途上国を含む世界の平和と繁栄に貢献し、同時に、日本の国益の確保を図る上で重要な取組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してい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2023.4.7)

我们认为,ODA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同时对于保障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是一项重要且意义重大的举措。

此外,图1显示,汉语中道义情态占比高达31.5%,远高于日语的8.9%。在中国外交话语中,“应/应该/应当/该”“要”等道义性情态广泛用于表达行为必要性,此类表达多以动词谓语句形式出现(例4),行为主体几乎全部指向“他者”或“中方与他国共同构成的国际主体”,既强调他者责任担当,又呼吁对方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相较之下,「べき」的语义指向与句法结构明显不同。首先,「べき」所指行为主体既可为“自我”,也可为“他者”,或为包括日方在内的“多个国际主体”。其次,在句式结构上,与汉语中常见的断定句式不同,日语中「べき」极少独立构成句子的核心谓语,「べきであり」等强断定形式仅出现1次,其他「べき」出现时,几乎全部被嵌入关系小句中,或以「いかに〜べきか」的疑问句式出现(例5),从而有效减弱语气的直接性和命令性。

(4) 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要总结历史经验,把握世界大势,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确定位。(2023.12.7)

(5) ウクライナが懸命に祖国を守る努力を続ける中で、ウクライナの将来を決める交渉、これにいかに

臨むべきかは、ウクライナの人々が決めるべき問題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2023.10.4)

在乌克兰人民为守护祖国不懈奋战之际,应当如何开展决定乌克兰未来的谈判,我们认为这是应当由乌克兰人民自行决定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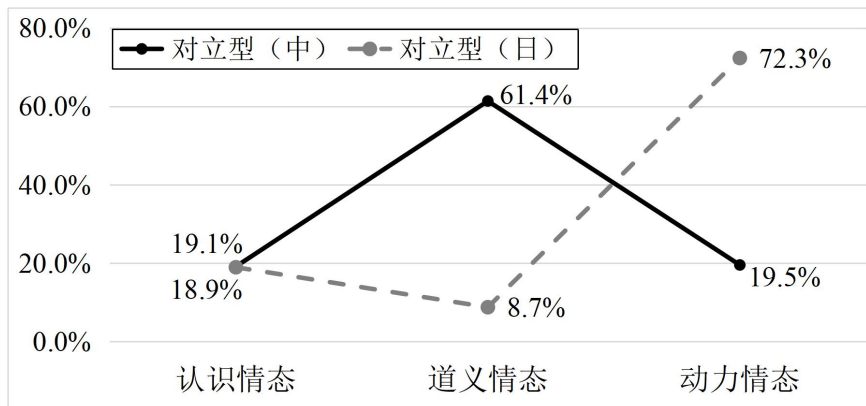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合作型话语中,中日两国虽均高频使用动力情态表达对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但在道义情态与认识情态的选择上仍表现出明显分化:中国更倾向于以道义情态凸显合作的必要性,强调集体责任与对等合作;而日本则更偏好以认识情态表达对外交事件的判断与评价,避免对他国行为进行直接评价或要求。

3.3.2 对立型外交话语

图2对比了中日两国在“对立型”外交话语中所使用的情态类型。可以看出,对立型话语当中,中国外交主体更倾向于使用道义情态(61.4%),而日本外交主体仍偏向于动力情态(72.3%)。

具体来看,中国外交主体高频使用“应/应该/应当”“要”“需要”等表强义务的道义情态。以“应/应该/应当”为例,分析发现,主语为“美国/美方”的次数高达43次,主语为“日本/日方”的次数高达19次。例(6)是针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行为的发言,外交主体首先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再以道义情态“应”突出日方理应实现的行为。该语境下的道义情态指向他者,话语表达方式直接明了。在这种语境中,“对立”往往被建构为原则性的态度主张。

(6) 中方坚决反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日方应当为此提供全面配合,严防核污染水排海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2023.10.30)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本文统计结果制作而成。

图2 中日对立型外交话语中的情态类型分布对比

反观日本,在79条对立型回答中,表达愿望的助动词「たい」出现65次,仍然高度倾向于使用动力情态。例(7)是日本外务大臣就福岛核废水排海后,日本国内部分个人及团体接到来自中国的所谓的“骚扰电话”一事发表的言论,并未直接表达反对立场,而是先使用情感名词「遺憾」与情感动词「憂慮する」来体现日方的消极态度,继而通过动力情态「たいと考える」将消极情感转化为积极态度,从表达负面情感转而强调“通过双方努力构建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该话语的主语始终固定在“我方”,从而回避了对事件本身的直接评价,“对立”被构建为一种柔性、可调节的态度表达。

虽然同样偏好动力情态,但从动力情态的动词搭配来看,日本“对立型”与“合作型”相比有一定差异,主要包括「差し控える」「ていく/てまいる」「求める」「働きかける」「要請する」「注視する」「示す」「対応する」

「取り組む」「検討する」等。其中「求める」「働きかける」「要請する」「注視する」仅在“对立型”中高频出现。这些动词主要代表日本对他国行为的间接要求,与动力情态结合后,其语气从命令式转为意愿式,既传达立场,又保留合作空间,体现出日本外交“在对立中寻求协调”的修辞逻辑。

(7) ご指摘のような事案が生じておりますこと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憂慮しております。……日中両国の「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双方の努力で構築していくためにも、中国側には冷静かつ建設的な対応、これを求め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2023.8.29)

对于您所指出的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深感遗憾并表示担忧。……为了通过双方努力共同构建日中两国“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我们希望请中方保持冷静,并采取建设性的应对措施。

当然,日本在对立型话语中也存在直接表明“谴责”或“反对”的表达(例8),但此类直接表达并不多见。统计发现:对立型话语中,中国外交主体直接表达了“谴责”或“反对”的回答数量占比63.2%,日本仅为36.7%。该结果再次印证中国外交主体倾向于直接明确的立场表达,日本外交主体倾向于间接柔性的立场表达。

(8) 日本からは、石兼(いしかね)国連代表部大使が出席の上で、北朝鮮による度重なる挑発行為と安保理決議違反、これを強く非難するとともに、安保理が、国際の平和と安全に対する本来の責任を果たす重要性を強調いたしました。(2023.2.21)

日本驻联合国代表部大使石兼出席会议,强烈谴责朝鲜的多次挑衅行径及其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并强调了安理会切实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立型话语中,「たい」常与表示时间或空间推进的补助动词「ていく/てまいる」或副词「引き続き」组合使用(共53例),形成如「(引き続き)～求めていきたい」(持续要求)这样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机制表明,日本外交话语即便表达批评、担忧或分歧,也常常同时隐含了其“持续要求”与“责任延续性”的主观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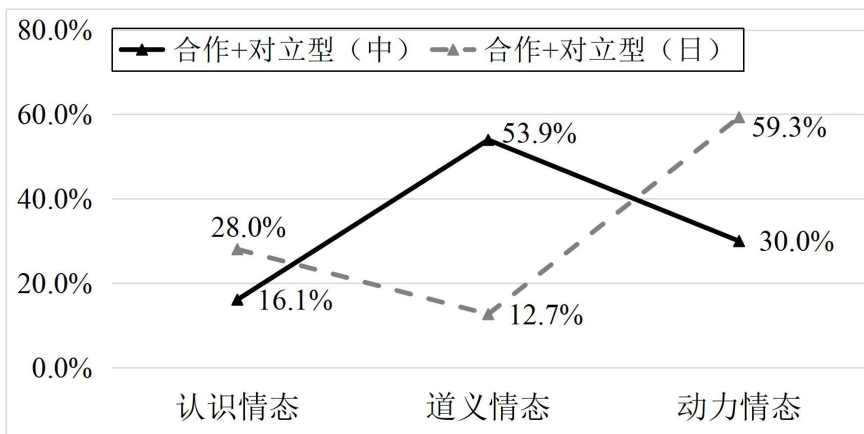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日本对立型外交话语虽名为“对立”,实则在语言层面体现出“意志主导性”和“责任持续性”的双重特点:其一,通过「たい」等动力情态表达形式,缓冲了对立言语的冲击力,体现积极应对的主观意愿;其二,通过「ていく」「引き続き」等表达形式,强调持续自身行为的意志,构建出责任延续的主体形象。这与中国外交话语中通过道义情态强调对方责任、凸显原则立场的表达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3.3.3 合作+对立型外交话语

下页图3分析了中日在“合作+对立型”外交话语上的情态类型选择差异。可以看出,图3与图2极为相似,中国外交主体更倾向于使用道义情态(53.9%),而日本外交主体仍然偏好动力情态(59.3%)。

中国“合作+对立型”外交话语当中,道义情态占比53.9%,介于合作型话语的道义情态(31.5%)和对立型话语的道义情态(61.4%)之间。动力情态占比30.0%,同样介于合作型话语动力情态(56.3%)和对立型话语动力情态(19.5%)之间。这说明中国“合作+对立型”话语的情态表达既映射了合作型话语的特征,又反映了对立型话语的特征。这种表达形式不只是语言层面的折中,而是体现了外交主体在复杂语境中策略性调适语气、整合多重立场的语言能力。

例如(9)首先使用道义情态“应”指出美国解决国内毒品泛滥问题时“甩锅推责”的错误行径,表达了消极态度,接着通过动力情态“愿”表达了中方希望同国际社会合作的积极意愿。这种“先批判、后合作”的话语序列不仅具有外交策略上的制衡意味,也展现了中方在坚守立场基础上推动合作的弹性语言策略。它通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本文统计结果制作而成。

图3 中日合作+对立型外交话语中的情态类型分布对比

过情态转换,构建了批判与合作并存的言语空间,实现了立场表达与关系维系的双重目标。

- (9) 美方理应尊重事实,反躬自省,纠正错误,停止甩锅推责的惯用伎俩。……中方支持墨西哥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愿与包括墨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打击跨国毒品犯罪活动,继续为全球毒品治理贡献力量。(2023.5.15)

而日本“合作+对立型”外交话语的情态类型仍然以动力情态居多(59.3%),道义情态最少(12.7%),呈现与对立型话语几乎完全一致的情态使用倾向。这说明,在需要表达批判立场时,日本始终以表达“我方意愿”的动力情态主导话语结构,维持一致性的表达风格。例如(10)的外交主体首先表达了日本谴责哈马斯组织的消极立场,再通过动力情态「たいと考える」再次表明日本与各国保持密切合作的积极态度,而非以道义情态明确要求对方承担责任。

- (10) 我が国は、これまで、ハマス等によるテロ攻撃を断固として非難した上で、……我が国といたしましては、引き続き、各国と連携をし、事態沈静化に向けた外交努力を一つ一つ積み重ね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我国一贯坚决谴责哈马斯等组织的恐怖袭击,……同时,我国将继续与各国密切合作,逐步推进为平息局势的外交努力。(2023.10.24)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合作+对立型”中,动力情态搭配的动词既与“合作型”部分重叠,又与“对立型”高度相似,常见的有「差し控える」「ていく/てまいる」「取り組む」「対応する」「努める」「検討する」「主導する」「協力する」「続ける」「求める」「注視する」「示す」「積み重ねる」「強化する」「意思疎通を図る」等;说明在“合作+对立型”话语中,动力情态既可以表达积极的合作意愿,也可以表达对他国行为的间接要求。

在三类话语中,动力情态均与「差し控える」或「ていく/てまいる」高频共现,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外交理念表征意义;其一,无论议题性质是积极还是消极,日本外交主体均倾向于通过规避直接表态来弱化立场冲突,从而维持语气的克制;其二,「ていく/てまいる」强化了外交行动的延续性与责任承担,表明日方不论表达合作还是对立,始终将自我职责与长期投入置于叙述体系当中。换言之,该共现模式并非偶然,而是稳

定的外交修辞资源,体现出日语外交话语在立场表述与关系维护之间的精细平衡,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强调“协调性、持续性”的外交特质。

总结来看,中国外交主体能够在不同情境下根据需要调整情态的使用,不同的话语类型拥有完全不同的情态使用方式,而日本外交主体更倾向于保持话语表达方式的一致性和固定性,情态的选用与话语类型无关(详见表5)。

表5 中日不同外交话语类型特征对比

	中国外交话语	日本外交话语
合作型	动力>道义>认识	动力>认识>道义
对立型	道义>认识~动力	动力>认识>道义
合作+对立型	道义>动力>认识	动力>认识>道义
总结	情态动态调节	情态高度一致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上述分析结果总结制作。

4 情态表达与外交议题、国家形象建构的互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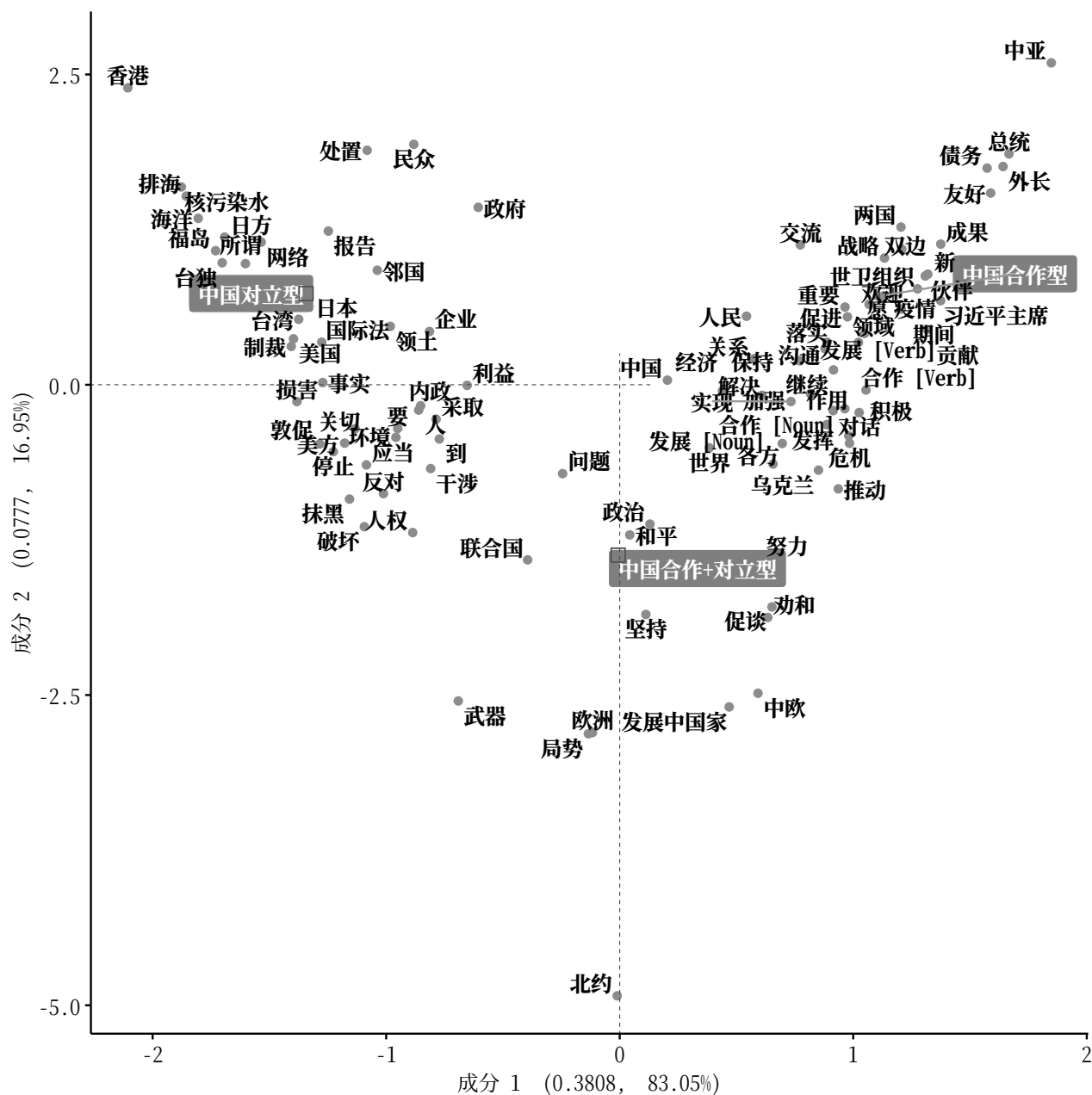
外交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软实力,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是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形象的关键元素和重要载体(杨明星,2021:11)。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外交话语视情境调配情态类型;日本外交主体则始终偏好更为缓和的情态类型。为进一步揭示上述语言差异背后的政治逻辑,本文引入中日不同话语类型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的结果,以系统阐明情态表达、外交议题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对应分析是一种旨在揭示各类资料中变量及其类别之间、或者多变量定量资料中变量和样品之间相互关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傅德印、王晶,2010:3)。在语言研究中,对应分析常用于解释不同语篇之间特征词的差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多个语篇的特征以二维分布图的形式展示出来(樋口耕一,2020:43)。

本文借助 KH Coder 3.0 对中日外交话语进行了对应分析。在设置参数时,外部变量设置为话语类型(合作型、对立型、合作+对立型),特征词勾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成分,最小出现次数设定为25,并根据卡方值筛选出差异显著的前100个词汇作为分析对象。需要说明的是,KH Coder 3.0默认以短单位分词,但在外交语境下,一些长单位词汇在分词后语义不完整,如“发展中国家”“核污染水”「広島サミット」「ウクライナ侵略」。为避免语义损失,本文使用了强制提取功能(force pick up)获取长单位词汇,以确保语义完整性和分析准确性。

中日对应分析结果分别对应下页图4、第99页图5。在这两个图中,每个点代表一个特征词,两点越靠近,说明它们的共现关系越强;两点越远,说明它们几乎不会同时出现。方块代表三类话语类型,靠近某类话语类型的词汇,代表该词在该类型中出现频率较高,反之则代表跟该类型的共现关系较弱。此外,坐标原点(0,0)代表总体平均水平,离原点近的词,表明该词在所有类型中的分布较为平均,没有明显偏向,而远离原点的词汇则具有较高的特征性和区分力。坐标轴则反映数据差异的主要方向。一般而言,坐标轴的解釋率越高,表示该维度能够更有效地揭示样本间的差异。图4与图5的横轴(成分1)解釋率分别为83.05%与73.78%,说明横轴所代表的差异维度最具解釋力,能够清晰地区分中日外交话语中不同类型之间的语义分布特征。基于此,以下部分将以横轴为主要分析对象,对中日外交话语类型的异同进行比较与阐释。

从横轴来看,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合作+对立型”都位于“合作型”和“对立型”的中间位置。该结果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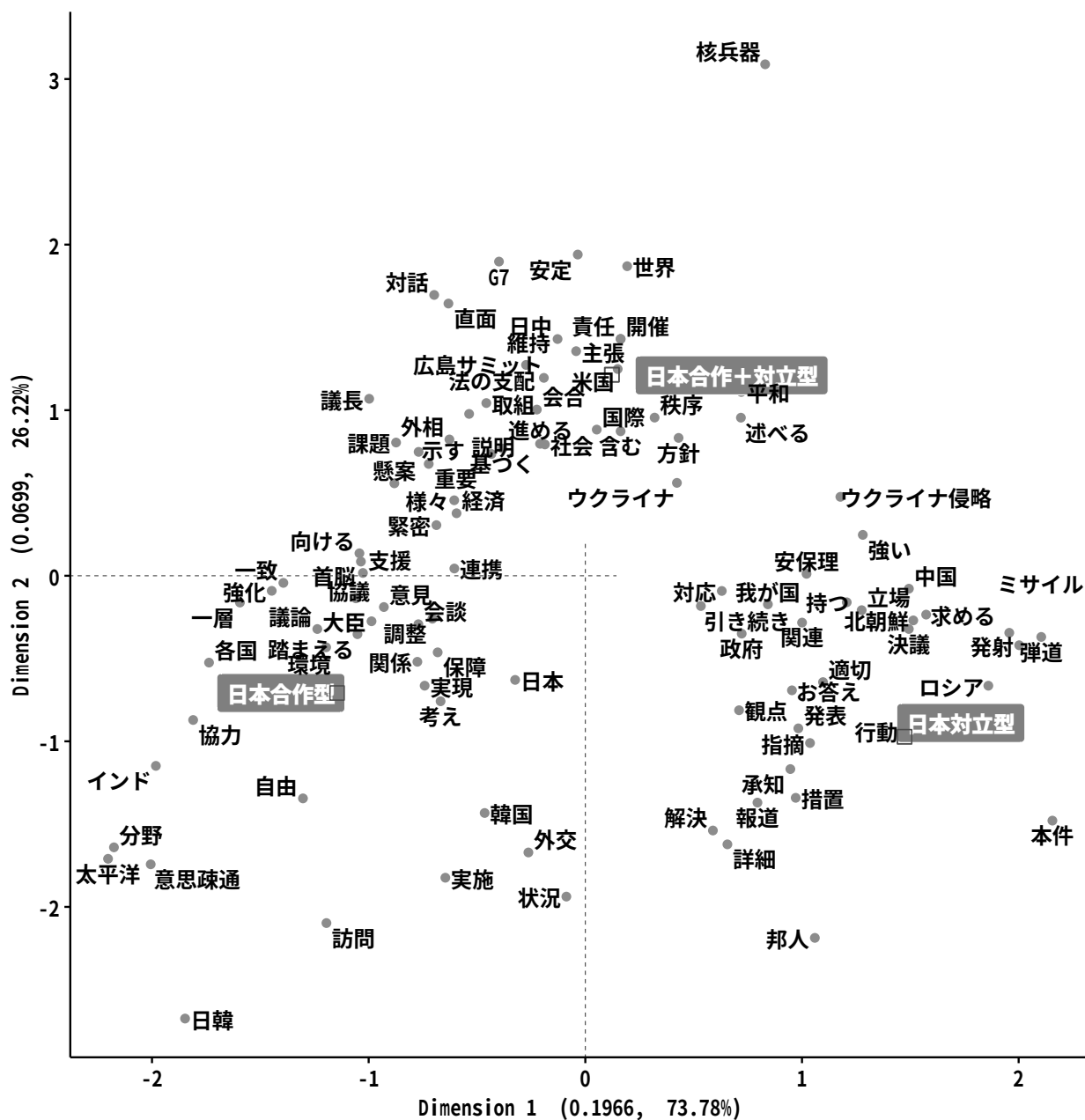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借助KH Coder 3.0制作。

图4 中国外交话语对应分析结果

了本文对中日外交话语类型划分的合理性,即“合作+对立型”在语义和情态特征上兼具“合作型”和“对立型”的属性。然而,从词汇分布来看,中日两国在这一类型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合作+对立型”周围词汇稀疏,“合作型”与“对立型”周围词汇高度集中;而日本“合作+对立型”附近则汇聚了大量特征词汇,“合作型”与“对立型”周围的特征词汇不如汉语集中。结合表4日本“合作+对立型”话语比例(32.4%)明显高于中国(21.7%)这一结果,本文认为这一差异反映出两国在外交话语体系构建与国家形象塑造上的不同取向。

图4、图5展示的是经卡方值筛选出的高频特征词。中国“合作+对立型”周围词汇稀疏,说明该类话语对应的议题分布较为分散,议题类型多样,并非高频强调的外交核心内容,例如“美国毒品治理”“应对气候



资料来源:借助KH Coder 3.0制作

图5 日本外交话语对应分析结果

变化”“伊核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自杀式无人机袭击”等议题仅出现一到两次,难以在对应分析的空间图中形成聚类。与此相对,中国“对立型”与“合作型”分别位于横轴的左右两端,各自聚集了大量特征词汇,显示这两类话语集中对应高频出现、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重大外交议题,且两者对应的外交话题类型差异巨大。“对立型”用于回应“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美国对华企业制裁”“美方抹黑中国”“领土争端”“台独”“人权”“反对干涉内政”等话题;“合作型”用于“与世卫组织共享疫情信息”“推动乌克兰危机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这一结果表明,“合作+对立型”在中国外交话语中对应的是外围或次要议题,较少触及国家核心利益;但“对立型”“合作型”多指向中国的政治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因此,在不同外交议题类型下,中国外交主体呈现出差异化情态选择逻辑:当议题触及国家根本利益、主权安全或重大战略利益时,往往倾向于使用明确的道义情态与直接判断性表达,彰显不可动摇、不可妥协的底线立场;当议题涉及务实合作、共同发展或国际协作时,则更多使用动力情态,以展现积极态度与合作意愿;而当议题可能损及他国利益或涉及中国边缘利益时,外交主体同时使用道义情态与动力情态,实现“表达立场”与“维护关系”的双重目标。这种表达策略的差异体现了“中国根据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来确定自己对外关系”(张清敏,2014:13-14)的外交理念,并契合中国长期坚持的外交原则,即“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习近平,2025:386)。因此,中国外交话语整体上呈现出立场明确、态度鲜明、语气直接的特征,较少使用语言缓冲策略,从而塑造出立场态度鲜明的“责任型大国形象”。

日本的“合作+对立型”话语相较于“合作型”和“对立型”,其周围聚集了更多特征词,表明其议题类型更为集中,如「米国」「G7」「日中」「法の支配」「広島サミット」「核兵器」「ウクライナ」等特征词指向日本外交主体反复强调的重大外交议题。特别是在应对俄罗斯核威胁等问题时,日本外交主体常强调“以国际法为框架”“以广岛峰会为契机”“与以美国为首的G7同盟国合作”等表述,形成在对立中寻求合作的修辞模式。与此相对,“合作型”话语主要高频词包括「インド」「太平洋」「自由」「協力」「各国」「強化」等,聚焦多边合作与地区伙伴关系。“对立型”话语特征词主要有「北朝鮮」「ミサイル」「弾道」「ロシア」「措置」等,以朝核问题、俄罗斯对乌战争为主要焦点,凸显地缘安全问题。由此可见,日本“合作+对立型”与“合作型”“对立型”各自对应不同的外交话题,其中“合作+对立型”同样触及日本重大利益的核心议题,这与中国的“合作+对立型”明显不同。

日本外交延续了战后“协调外交”的传统,在战略上依托日美同盟体系(孙崎亨,2014),以“通过合作与协调维持国际秩序”为基本取向。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日本外交青书2023》,日本外交的核心理念在于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及欧盟等同盟国家和地区的多层次合作,持续推动「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构想的深化和落实。该报告同时反复强调,在乌克兰危机、朝核问题、中日关系等重大议题上,要加强与同盟国的合作,实现地区安全与稳定,展现“在对立中寻求合作”的外交取向,体现出日本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以协调与合作维系国际秩序与安全的核心外交战略。

受此外交理念驱动,日本外交话语在不同议题下呈现出高度一致化的情态选择逻辑:面对共同发展或国际协作的议题时,高频使用动力情态展现积极态度与合作意愿;面对可能损害日本政治或安全利益的敏感议题时,仍然倾向使用动力情态,通过强调“日本希望持续要求某国……”或“与某方保持对立,并希望继续与同盟国加强合作”等表达结构,一方面传递不满态度,另一方面凸显积极应对姿态,并始终将“行为持续性”置于叙述体系当中。由此可见,动力情态在日本外交话语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意愿表达,还承担着将批评对立融入合作框架、弱化直接冲突色彩的修辞功能。换言之,日本并非通过道义性要求直接指责对方,而是通过表达“将继续努力”“希望与相关方合作”来完成对立立场的柔性展现。这种展现逻辑延续并深化了战后“协调外交”的历史传统,塑造出平衡、包容、合作的“温和型国家形象”。

5 结 语

本文基于自建“中日两国外交发言人专题语料库”,参考Palmer(2001)的情态体系框架,比较分析了合

作与对立等不同话语类型下,中日两国外交话语中情态表达的使用情况和分布异同,并探析了其成因。研究发现:中国外交话语的情态表达具有多样性、直接性和灵活性,构建了立场明确的“责任型大国形象”;日本外交话语的情态表达具有单一性、间接性和和谐性,体现了协调优先的“温和型国家形象”。话语分析中,“围绕语篇中微观话语策略的识解(construal)是难点之一”(孙成志等,2023:17-18)。本文的研究实践扩大了情态问题的研究视角,透过不同话语类型分析情态,将句法的微观视角与话语的中观视角、语境的宏观视角有效衔接,从而更加细微地识解语言表征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关系。但中日外交话语中,除情态表达外,与态度立场表达密切相关的模糊限制语、立场动词之间等有何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此外,本文聚焦共时层面的中日外交话语,未来拟扩大语料时间跨度,以检验研究结论并拓展分析深度。

[本文为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语态-情态”视域下的中日外交话语对比研究(批准号:24CYY057)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陈冬姝]

参考文献

-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马倩,文秋芳.合作型与对立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对比分析[J].外语学刊,2022(3).
- 王彦,陈建生.外交情态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新视角[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2).
- 王振来.论能愿动词的语义类别[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2(1).
- 王晓华.现代日汉情态对比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 冉永平.人际交往中的和谐管理模式及其违反[J].外语教学,2012(4).
- 冉永平.冲突性话语趋异取向的语用分析[J].现代外语,2010(2).
- 毕卓,刘风光.基于仪式规程理论的外交话语冲突性回应策略研究[J].现代外语,2022(6).
-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任凯,王振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情态对比研究——以政治新闻语篇为例[J].当代外语研究,2017(2).
- 孙成志,王成一.评价理论态度系统视域下集体身份的话语建构——以日本主流报纸“中国技能实习生”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3(3).
- 孙崎享.日美同盟真相[M].郭一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 严世清,赵霞.政治语篇中的情态表达及其批评性话语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 李运博,卿学民.时政文献的日文翻译方法与策略——以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的日译本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5(1).
- 李莉.统计学原理与应用[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李鑫,胡开宝.基于语料库的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情态动词的应用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3(3).
- 李鑫.政府记者会汉英口译中情态偏移的描述性研究[J].外语教学,2018(4).
- 杨明星,王钊繁.外交委婉语的文体特征、修辞原理与话语功能[J].中国外语,2020(2).
- 杨明星.新文科时代外交话语学科构建与外语学科转型发展[J].中国外语,2021(4).
- 张清敏.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J].外交评论,2014(2).
- 金稀玉,王怡雅.语言顺应论视角下信息过量话语现象分析——以日本外务大臣答记者问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4(2).
- 胡开宝,田绪军.中国外交话语英译中的中国外交形象研究——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中国外语,2018(6).
- 胡开宝,李婵.国内外外交话语研究——问题与展望[J].外语教学,2018(6).
- 修刚,李运博,花超.十九大报告翻译实践与中央文献的日语翻译策略[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2).
- 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2.
- 黄一峰,姚艳玲.日语政治演讲语篇批评隐喻分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1(3).
- 曹金波,Dániel KADAR,福岛佐江子.日本政治语体变异及其语用功能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4).
- 龚双萍.冲突性军事外交话语中合法化的语用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6).
- 崔希亮.事件情态和汉语的表态系统[C]//中国语文杂志社.语法研究和探索:12.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
- 傅德印,王晶.对应分析统计检验体系探讨[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3).

- 仁田義雄. 日本語のモダリティとその周辺[M]. 東京: ひつじ書房, 2009.
- 玉地瑞穂.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モダリティの対照研究——言語類型論の観点から[J]. 高松大学紀要, 2005(44).
- 高梨信乃. 評価のモダリティ: 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記述的研究[M].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2010.
- 益岡隆志. モダリティの文法[M].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1991.
- 野田春美. 「のだ」の意味とモダリティ[M]// 澤田治美, 編. モダリティII: 事例研究. 東京: ひつじ書房, 2012.
- 樋口耕一. 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M]. 2版. ナカニシヤ出版, 2020.
- Brown P, S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ousfield D. 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Culpeper J.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 349-350.
-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995.
- Fu Rongbo. Comparing modal patterns in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ed and translated discourses in diplomatic setting——A systemic functional approach[J]. Babel, 2016(1): 104-121.
-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Lampert G, Lampert M.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s) of Modality: Essences and Ideologies[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0.
- Norricks, N. R. & A. Spitz. Humor as a resource for mitigating conflict in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10): 1661-1686.
- Palmer F.R. Mood and Modality[M].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antucci V, Wang A Q. Illocutional concurrences: The case of evaluative speech acts and face-work in spoken Mandarin and American English[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8(138): 60-76.
- Wodak R, Michael M.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M]. 3rd ed. London: Sage, 2016.

作者简介: 陈冬妹 女 汉族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 对比语言学、话语分析
联系方式: E-mail: chen.ds@bfsu.edu.c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alit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CHEN Dongsh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Modality reflects national stance and underlying ideology,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s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Drawing on diplomatic spokesperson statements from China and Japan in 2023, this study examines modality in cooperative and confrontational discourse types, comparing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stance expressi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underlying them.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predominantly features "cooperative" and "confrontational" types, with modality choices shifting according to discourse type: cooperative discourse favors dynamic modality, while confrontational discourse favors deontic modality. This pattern highlights diverse and direct stance-expression strategies, shaping an image of China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with clear and explicit positions. In contrast, Japa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is characterized mainly by "cooperative" and "cooperative-plus-confrontational" utterances, with purely confrontational discourse being relatively rare. Regardless of discourse type, Japanese spokespeople consistently prefer dynamic modality, reflecting a uniform and harmony-oriented stance-expression strategy that constructs Japan's image as a "moderate, coordination-oriented state".

Keywords: diplomatic discourse; political discourse; modality; national image

(责任编辑: 李广悦)